



陈笃彬，男，
1951年生，福建泉州人。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。现为泉州师范学院院长、研究员。



苏黎明，男，
1957年生，福建南安人。198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。现为泉州师范学院教授、图书馆馆长。

泉州古代科举

陈笃彬
苏黎明
著

齐鲁书社

二人。一甲直接授官,状元授翰林修撰,榜眼、探花授翰林编修,二、三甲还要经吏部考试,择优选为翰林庶吉士,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外官,品级从五品到七品不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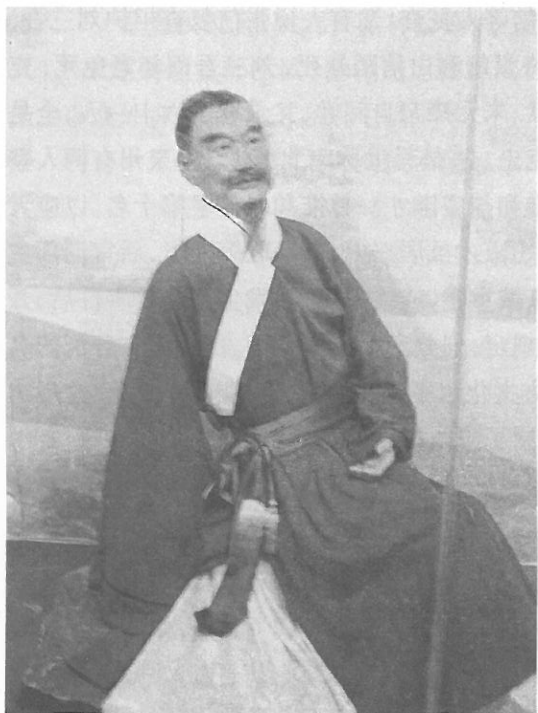
明初一开科,泉州举人在会试中便显示出相当的实力。洪武三年(1371年)诏开科举,次年会试,朱元璋亲制策问,试于奉天殿,录取了一百二十名进士,福建占二十四名,泉州有晋江的陈章应与何德举二人。随后又令各省连续三年乡试,所有举人免于会试,赴京听候选官。连考三年后,朱元璋发现所录取的人才,大多是“后生少年”,文章虽写得头头是道,却缺乏实际工作能力。于是,洪武六年诏令暂停科举,改用荐举。但荐举的情况并不比科举好,使朱元璋感到科举制度还是有优越性,于是又下诏复科举。洪武十八年(1385年)重开会试,取了四百七十二名进士,福建占五十九名,状元丁显也是福建建宁人。泉州举人取得不错的成绩,共有六人登榜,其中晋江人黄惟清前一年刚中解元,是连捷进士。但这些进士没有马上被授官,因为从这时开始,朱元璋为扭转考用脱节,进士缺乏历练之弊,在进士与授实职之间又加进一段实习培训阶段,称为观政,即令新第进士观政于诸司,然后视各人情况分别授官。

自此开始,明代大多数进士榜上,都可看到泉州举子的名字。不过,从明初到正德初年(1506年),泉州举进士的数量不是很多。这里有两个客观因素:一是明代中期以前进士录取名额虽没有定制,但相对较少,一般仅百名左右,最少的一次只有三十一人;二是当时实行“分地而取”的原则。明初礼闱取士,不分南北。洪武三十年(1397年),学士刘三吾、白信蹈任会试主考,录取了五十一人,全部为南方人,状元陈安是福州人,会试时即已取得第一名,故是连中二元。但发榜后,北方考生不服,说考官是南方人,如此取士是偏袒同乡。朱元璋知道后非常生气,派前科

状元时为侍讲的张信等人复查。又有人说张信复查袒护刘三吾,朱元璋更加生气,将张信和白信蹈处死,刘三吾因年老免死,充军边疆,陈安也下狱。朱元璋亲自阅卷,又录取了六十一人,全是北方人,状元为韩克忠。故是科世称南北榜进士。泉州有两人登南榜,即晋江的林惟和与庄谦才。林惟和居二甲第十名,以应天府举人身份应试的庄谦才虽居三甲,却是联第进士,后官刑部主事,曾奉命董理北京城重建,成绩卓著。在发生南北榜事件后,开始对录取籍贯作出规定,划分南北录取名额。尽管南方分配的名额还是较多,但南方文化水平总体比北方高得多,因而,这规定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泉州举子的中式。

明代前期有几榜值得一提:成化二年(1466年)罗伦榜,泉州有晋江的包文、赵瑶及惠安的谢宁等三人,而状元罗伦虽非泉州人,却与泉州有着不解之缘。罗伦(1431—1478年),号一峰,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。参加殿试时,对策万余言,直斥时弊,名震京师。中状元后,授翰林修撰之职。为人刚正廉明,抗直敢言,不避权贵。因疏劾大学士李贤“丁忧”期间破例任职一事,触犯了朝廷,于成化五年被贬为泉州提举市舶使。时泉州海交商贸已衰落,不久市舶司又迁往福州,罗伦空有其职,又厌恶官场腐败,于是栖居泉州城北梅花石东畔的真净观,聚集生徒讲学,向他求学者络绎不绝,一时名声大振。嘉靖年间,人们将他在泉州的讲学之所改建为书院。这就是古代泉州著名的一峰书院的由来。

成化二十年(1484年)李旻榜,泉州只有二人,但其中有大名鼎鼎的蔡清,字介夫,号虚斋,晋江人。蔡清自幼好学,举进士前七年乡试中解元。举进士后,曾做过礼部主事和南京文选郎中的官。但他的一生中,大部分时间还是在泉州讲学。他熟读程朱的性理之书,特别对他认为是“五经之首”的《易经》,研究得特别



图十一 蔡清像

中有时称神童的晋江人顾珀。据府志载，顾珀出生的时候，清源山鸣。五岁时，即善于对偶。蔡清曾对他试一联：“宰相本书生”，顾应声而答：“忠臣系孝子”。

弘治十五年（1502年）康海榜，泉州六人登榜，其中南安的黄河清，也是当时泉州的一位才子，与蔡清和王阳明过从甚密，十八岁即中举人。举进士后，历官吏部郎中，太常少卿，以善举荐贤才著名。

从正德年间开始，泉州登进士榜的逐渐多了起来。正德六年，泉州有一位时称为神童的傅楫登榜。傅楫的祖父傅凯，成化十四进士。傅楫五岁时，泉州太守冯驯拜访其祖父傅凯。傅

精深，能“发前人所未发”，提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。故讲学期间，不远千里前来求教的不少，生徒满天下。他的著作很多，最著名的是《四书蒙引》，为明代《四书》研究的最重要著作之一。

弘治十二年（1499年）论文叙榜，泉州三人榜上有名，其

楫见冯，冯用自己的姓名作一对：“冯二马，驯三马，冯驯五马大夫”。令傅楫对。傅楫问祖父：“古人名可作对吗？”傅凯答：“可以。”于是傅楫脱口而出：“伊有人，尹无人，伊尹一人宰相。”冯大为赞叹，认为将来必成大器。后傅楫果然中进士。尤其是正德十二年（1517年）舒芬榜，泉州不仅有六人登榜，且其中陈琛、张岳、林希元三人，都是明代泉州的著名人物。陈琛（1477—1545），字思献，号紫峰，晋江人，被誉为明代泉州“第一通”。当时学者都称他“紫峰先生”，故知道他别号的比知道他正名的人更多。这位才子热爱紫帽山，故取紫峰为别号。少年读书时就显出不凡气概，颇得启蒙老师李聪赏识。弘治十一年，二十一岁的陈琛初次应乡试，因“不交贿用”而名落孙山，但坦然面对，意气不

伤，写诗自励：“长使心闲涵水月，不妨脸上污尘埃”。又题曰：发愤三年，须是不炉不扇；把持一敬，莫教愧影愧衾。二十五岁时，其才学得到蔡清的赏识。蔡看了他的文章，非常惊异，赞不绝口，陈因此成为蔡最得意的门生。蔡清死后十年，陈琛再次应举，三十四



图十二 陈琛像

岁中举人，四十一岁举进士。他在会试时所答的试卷颇得考官赞誉。考官尹襄看了他的试卷后，推荐给作为主考的大学士靳贵，认为“造诣精深，不堕举业蹊径”；靳贵反复看了数遍后说：“必出陈白沙门下或师蔡虚斋，他人不能为此！”举进士后，先授刑部主事，后擢吏部考功郎。因得罪某些权贵，告别官场，居家潜心教育与著述，对泉州的文教事业作出了许多贡献。陈琛为官仅五六年，且官位不高，在泉州所以颇负盛名，不在他的官位，而在他的学问。中举人之前，即已完成了泉州四大名书之一的《四书浅说》。

张岳（1492—1552年）字维乔，号净峰，惠安人，生于科第世家。祖父张纶及父亲张慎均中举人，弟弟张峰也在嘉靖年间举进士。张岳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，抱负远大，好读书且善读书，尤



图十三 张岳像

精于程朱理学。二十岁参加乡试，中了解元。《闽书》载有这样一件事：张岳中解元，时各省省会皆有中官镇守，中式举人照例要去参谒，且都必须跪见，而张岳不跪，只是作个长揖而已。惹得中官非常气愤地说：“今岁解元，难道是琉球国来的考生吗？”四年后，二十四岁的张岳举进士，也是明代惠安自弘治至正德年间唯一的进士。张

岳入仕四十年，开府四镇，总督七省，经文纬武，既是大儒，又是大将，为官时文治武功，所到之处都有政绩。张岳平生著述甚富，有《小山类稿》、《泉州府志》、《惠安县志》等。

林希元，同安人，举进士后历官大理寺丞、钦州知府。辞官归里后，长期从事教学和著述，学术精湛，声誉卓著，是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。

陈琛、张岳、林希元三人不仅是同榜进士，且志趣学识相同，互相以道义相许，经常在一起讲易、论道、谈文、说诗。三人以朱子学为宗，力排王阳明学说，不遗余力捍卫和发展朱子学，时称为“泉州三狂”。明人蔡献臣说：“明正德丁丑榜，吾泉最号得人，学宪公琛，襄惠公岳，而大理寺丞次崖林公希元也。三先生皆精于经学，以文章气节名一时，而作用不同，际遇亦异，甚为学士所宗，而称我明人物第一流则一。”（《惠安县志·轶事》）一榜中居然同时集聚着三位这样的人才，轰动一时。

进入嘉靖年间，泉州在进士考试中成绩更加突出。从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至崇祯末年（1643年），大多数进士榜上，泉州都有十名左右，大体均占全国进士总数的三十份之一，只有嘉靖二十三年（1544年）秦鸣雷榜例外，此榜共取三百二十二名，泉州有八十多名举子参加会试，却全部落选。嘉靖年间，泉州不仅每榜进士数大增，且当中有不少著名的人物。

嘉靖五年龚用卿榜，状元是福州人，泉州有六人，其中有著名文学家王慎中。王慎中（1509—1559年），字道思，号遵岩，晋江安海人。据载，王慎中四岁能赋诗，日能诵千语。十三岁师从理学鸿儒易时中。十六岁乡试中举，十七岁中进士，可谓大器早成，少年得志。登第后，初授户部主事，不久改调礼部。当时，唐顺之、李开先等名士都在礼部办事，他们之间相互讲习，名噪一时，有“嘉靖八才子”之美称，王慎中为其首。嘉靖十年，赴广东主持乡

试，录取的解元林钦，于次年高中状元，由此大大博得识才之誉。其时，王慎中已满负文名，朝廷也想擢升他为翰林，可他秉性清直，恃才傲物，难免开罪于人，谗言诽谤，如此，不但翰林没当成，反被挤出京门，三十三岁时被罢官，在与大自然和诗文为伍的生活中，度过了近二十年的后半生。王慎中的最主要影响，在于开明代中叶文坛上反复古主义的先河。明初诗文大多是歌舞升平之作，先有“台阁体”，继之有“茶陵诗派”。明代中叶，先有以李梦阳为代表的“前七子”，继之又有以李攀龙为代表的“后七子”，提出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的口号，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复古主义运动。这一文学思潮在反对僵化的“台阁体”方面起了一定作用，但一味以模古拟古为能事，出现了严重的反现实主义倾向，走上纯粹复古主义的歧途，给文学带来



图十四 王慎中像

一次新的重大危机。王慎中与唐顺之倡导的反复古主义的古文运动，继承南宋以来推崇唐宋“八大家”的传统，给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思潮沉重打击，两人因而声名远播。王慎中以古文传世，又有不少诗作，著作有《遵岩集》。

继王慎中登第三年后，嘉靖八年（1529年）罗洪先榜，泉州有十二位，为入明以来至

此人数最多的一榜，梁克家的后裔梁怀仁，以及孙蔡克廉、庄一俊、庄用宾、洪富等明代泉州名士都在该榜。梁怀仁，“周岁识字，三岁诵书，四岁善草书吟诗，经传子史，无不能读。”十六岁中举人，中进士时仅二十岁。不幸的是，三年后即病逝。晋江人洪富，府志载他：“为诸生时读书秀林庵，苦心易理，著浅说，常达旦不寐。一夜更阑，有告者云：‘君且休也，读亦参政，不读亦参政’。启户视之，不见其人。盖庵神也。后第嘉靖己丑进士，官蜀大参。”

嘉靖十一年（1532年）林大钦榜，会试第一名乃福清人林春，但殿试未能进入一甲。是榜泉州有十人，包括陈让、刘汝楠两位解元及郑普、陈储秀、柯实卿等。陈让，字以礼，号见吾，晋江人，陈紫峰族弟。少时聪慧敏达，记忆力超凡，嘉靖十年举乡试第一，次年举进士。科场上可谓春风得意，但官场并不得志。举进士后，授监察御史，曾遭诬陷而下狱，不久后虽官复原职，但在嘉靖十七年为圣皇太后葬事上疏，言不中听，再次触怒嘉靖皇帝，从此告别仕途，为官时间不到十年。削职家居的几十年间，撰文著书，留下著述甚丰，王慎中、陈琛、张岳等对他都很推崇。郑普，字汝德，号海亭，南安人。举进士后，历官至云南知府，以善吏治并精通经学著称，著有《海亭文集》。陈储秀，南安人，少时家庭贫困，但聪颖勤奋，联第进士。嘉靖十四年（1535年）韩应龙榜，泉州有晋江的周天佐、惠安的康朗等六人。周天佐，府志载他家贫，但从小爱好读书，且过目成诵。举进士后，任户部主事，任职严谨，为人耿直。举进士后六年，上书言时政得失，得罪了嘉靖皇帝，嘉靖看了他的奏疏，大怒，下诏抓入狱中，不到三天就死于狱中。康朗，字用晦，号盘峰，年轻时曾结庐于惠安大东山攻读，书写了三副对联，一曰：户外舞云烟，咫尺天衢万里；山中飞红紫，分明春色一家。二曰：破屋无遮头，时见风云际会；家贫虽彻骨，

亦有经史良图。三曰：懒筑垣墙，恐天地笑人迂拘；大开门户，放山川入我胸怀。某次，张岳前往大东山，见他书斋的对联，非常赞赏，认为他文采出众，胸有抱负，他日定能出人头地。果然，嘉靖十年他参加乡试中举人，四年后中进士，累官至金都御史、副都御史。

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年）唐汝楫榜，泉州也是人才济济，不仅有同安的李春芳、王三接，晋江的郭立彦等十七人，且晋江的田杨取得二甲第一名，即明代泉州的第一个传胪，而南安傅夏器会试第一，为泉州取得明代第一个会元。傅夏器（1509—1594年），字廷璜，南安锦田人，人称锦泉先生。据载，曾在紫帽山麓读书，非常用功，一拿起书卷，就十分专注，以至夜半时常有神灵在空中呼他“就寝”。后李廷机也在这地方读书，故有“一馆两会元”之称。二十岁时所读的书已达万卷之多。二十三岁参加乡试，考中第六名举人。后赴京参加会试，屡次落第。尽管如此，并不灰心，更加发奋苦读。他在书桌下放一个瓮，每经构思写出一篇文章，不论好坏，就点上火放进瓮里烧掉。有志者事竟成，经近二十年的刻苦自励，终于在四十二岁时举进士，且夺得会元桂冠。他会试时所写的文章，得到很高评价，京都人士盛赞为“从来会元所未有”。时宰相严嵩独揽朝政，搜罗党羽，排斥异己。他也看中傅夏器的才学，想拉拢他，但傅不为所动。严嵩怀恨在心，廷试时不让傅夏器获得状元、榜眼，甚至连探花也不给。当听到官员们交口称赞傅夏器时，严嵩碍于众官员的面，只好笑着说：“这个人还算朴实。”勉强给个礼部仪制司主事的官。傅虽满腹经纶，因不媚权贵，终生不受重用，只做到吏部郎中，就被罢官归里。归家后，在丰州锦田过起田园生活。因学识渊博，登门求教者络绎不绝。隆庆年间，受聘协修《泉州府志》。继傅夏器后一榜的晋江人邱有岩，十七岁时已文才出众，泉州太守俞咨伯考校士子，对他

的文章大加赞叹，称为“天下名士”，把他列为第一名，进士及第时才三十出头。

嘉靖三十八年（1559年）丁士美榜，会试时第一名的福州人蔡茂春，殿试时同样未能进入一甲，倒是一位漳浦人林士章进入一甲，取得探花。是榜泉州有九人，少年得志的晋江人蔡一槐就在这一榜，乃是连捷进士，是年仅十七岁。仕途也并不显赫，先为户部主事，后为湖广金事御史。嘉靖四十四年范应期榜，泉州有十三人，以直言敢谏著称的御史詹仰庇就在这一榜。詹仰庇，字汝钦，安溪人。举进士后，初为南海县令，后授御史。隆庆初年，穆宗皇帝下诏购买珠宝，户部及朝内许多人都劝不住，詹上疏痛陈利害，经把皇帝劝住。不久，又听说皇帝耽于声色，把陈皇后斥到后宫，他再次冒“触讳”风险，上疏劝止。这种直言敢谏的性格，注定要吃大亏。果然，在一次规劝皇帝不要动用库银修宫苑时，把皇帝触怒了，罢了他的官，并杖责一百大板。神宗皇帝上台，又起用他当御史，但已极为失望，不久即乞归故乡。同榜的晋江人郭立彦，字如选，读书至二十岁，因家齿浩繁，生计渐艰，曾弃学从商，经营六七载，渐渐无意功名。据载，有一天遇到一个善看相的人，说他“将来不惟功名远大，即气节亦必有大过人”，劝他刻苦励学。郭听了这番话，心有波动，便在二十八岁这年，就学于南京名儒李古衷门下，三十岁考入府学，越两年，考中举人，四十八岁时才举进士，官至刑部给事中。

隆庆二年（1568年）罗万化榜，会试时福建大田的田一隼取得会元，殿试时也没有进入一甲。而泉州同样成就显耀，不仅有黄凤翔、王用汲等十八人，且黄凤翔还获得榜眼。黄凤翔，字鸣周，号仪庭，晋江人，嘉靖四十年乡试第四名，七年后举进士。初授编修，后累升至南礼部尚书，因不满张居正擅权，以母亲年事高需照顾为由，上疏辞任，不再复出。死后谥文简，故人称“黄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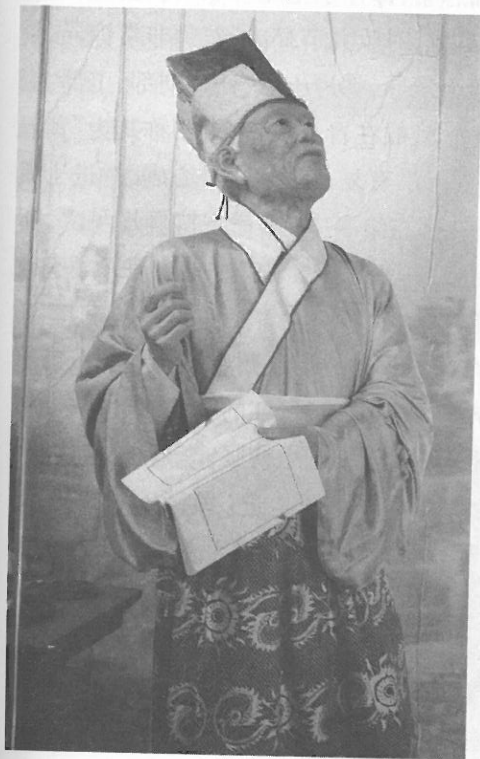
简”。黄举进士四十余年，为官仅十三年。为人忠厚公正，处事谨严，不畏权贵，不趋炎附势。曾多次担任会试同考官，能秉持公正。万历八年，张居正二子参加会试，通过别人示意黄在关键时刻加以照顾，黄严词拒绝。万历十年，南畿秋试，少宰王篆亦“欲私其子”，让人出面宴请黄，他一如以往，“复谢不往”。这与当时朝政用事之人皆通关节，皆用贿赂，使“居正三子皆登上第”的腐败现象，形成强烈对比。黄知识渊博，著述甚丰，除参与纂修《世宗实录》和《会典》外，万历年间修的《泉州府志》二十四卷，也是他所主持，它是现仅存的两部《泉州府志》之一。同榜的晋江人王用汲，举进士后入为户部员外郎。也曾因触犯张居正而被撤职，屏居郭外，布衣讲授。张居正死后，起任顺天府尹，历南京刑部尚书。他为人清廉，为人耿直。万历十五年，举世闻名的“海青天”海瑞病死于任所，家贫如洗，无力购买棺椁。王用汲前往探视发现后，才为筹集费用收殓。

万历年间，泉州在会试中的表现更是非同一般。万历二年（1574年）孙继皋榜，泉州有十三人，中有南安的苏希栻、洪有声和晋江的郭惟贤等人。苏希栻（1531—1620年），字于钦，号阜山，少时博涉群书，为文敏捷，人们比之为扬雄、班固。十八岁时赴童生试，获第一名，入府学。学使朱镇山主持岁科考，将他选拔为泉州秀才之首，保送入京都五经书院。隆庆四年，三十九岁始中举，四年后登进士，授许州知府。任职期间，颇得百姓赞誉，但仅十个月即遭权贵打击而罢官。闻罢职讯，坦然对属吏说：“吾灯窗之事毕矣，余事付之后人。”罢归后，居南安杨梅山下，土室衡门，清贫自守，率儿孙躬耕自给，农余课儿孙读书。自题门联曰：“家有旧书惟教子，门无新事不迎宾。”关心乡梓，置义仓，修霞舒里社，筑太湖民堡，重修雪峰寺等。府县官闻知屡请，竟不得一见，却与告老尚书黄凤翔、退職御史詹仰庇等结社赋诗，读书怡

情。著述不少，主要有《杜诗全集注》、《杜诗选注》及《阜阳苏氏族谱》等。郭惟贤举进士后，拜南京御史，忤旨。调南京大理评事，累迁户部主事、左金都御史，后以丁忧归。也是一位耿直敢言的人，卓有建树，所著有《三台谏草》。

万历五年沈懋学榜，泉州有晋江的苏濬，惠安的王约，同安的黄文炳等七人。苏濬，字君禹，号紫溪，万历元年中解元，四年后会试得会魁。他在会试时所写的《朝闻道夕》这篇文章，颇得考官们的赞赏。他写道：“人生有涯，而道则无涯。苟以一息有涯之生，而闻千古无涯之道，则谓吾之身以一息为千古可也！”从这一

点出发，引申到大处，他又说：“太虚不能常聚而不散，而有得于道，则吾之生死亦天地间之旦暮也！”并以此强调：“以太虚之气还之太虚……以造化之形归之造化。”竭力阐述道是无始无终，不生不灭的；“闻道”则可以生，可以死，死亦生也。”这一为人宗旨，造成他“才高而学博，科巍而名彰，仕不择地，家不求田”，故辛苦宦海，潦倒一生。举进士后，初授南刑部主事，后起补为



图十五 苏濬像

工部，广西参政，又分教礼闱，凭不偏不倚之心，选得不少名士，后来政声显著的宰首李廷机，即其中之一。泉州民间有不少关于他的脍炙人口的传说。

万历八年（1580年）张懋学榜，泉州有明代晚期五次任过尚书，并受两朝皇帝顾命的重臣黄克缙（1543—1628年），字绍夫，号钟梅，晋江永宁人。据载幼时因父母早丧，生活十分困苦，常跟祖母到一赵姓富户家中帮厨打杂。赵家有钱，专门请塾师来教孩子，但这赵公子，又钝又懒，每每叫黄克缙替他写作业。后被塾师发觉。一天，塾师在黄送来中饭时，想试试他的才智，就指着盘中的龙虾，命他作对。黄略加思索，即伸手把龙虾取来剥食，塾师连忙制止，黄答道：“吾以五爪龙，对汝九节虾。”塾师非常惊异，赞叹不已，便收他为门生，悉心教导。举进士后，任过刑部、工部、吏部尚书，并两次出任兵部尚书，故在晋江一带，人们称其为“黄五部”。与黄克缙同榜的南安人洪有复，字懋纯，号心庵，举进士后初授湖南武陵知县，调任礼部左给事中，奉命主持贵州乡试，所选皆是一方人才。累官浙江按察使，终湖广左布政使，颇有政绩。

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朱国祚榜，泉州在该榜同样成就耀眼，不仅有永春的李开芳、李开藻兄弟，晋江的李廷机、庄履朋等十三人，且李廷机为泉州夺得明代第二个榜眼。李廷机，字尔张，号九我，浮桥人。少时家境贫寒，但好学上进。就读于某师塾，三年只告假七天，成了他专心求学的一段佳话。及长，以教书糊口。后参加院试，进第一名秀才。隆庆四年，中顺天府解元。万历十一年，会试第一，殿试第二，获榜眼，差点夺到状元，成为人们所艳羡的“连中三元”。明代有一位福建人林志，也和李廷机一样。他与同府的马铎争峰，可谓不相上下，可惜殿试不能夺魁，最后以解元、会元而登榜眼，离连中三元也仅一步之遥。李廷机以

榜眼资格初授编修，后迁南京吏部右侍郎，转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参机务，深得皇帝信任，但为群小所不容，连续一百二十余次乞求辞职，终获允准。泉州在宋代出了几个人朝辅弼的宰相后，历经元朝和明朝前期一直无人入阁，直到明代后期万历年间，才又出了李廷机这位秉政时间不长的宰相。李为官清廉，告老归里后，生活常难自给。他的《除夕》诗云：“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七般都在别人家。”穷窘之状，可见一斑。李在泉州西门五塔巷内的故居，宅甚迫仄，仅一厅两房。民间传说，因他为人廉洁，治政爱民，极为神宗器重。某天皇帝问他：“朕欲赐卿于故里营造新相府，卿意如何？”李答：“臣故里泉州浮桥，濒江临街，甚为宽敞，无庸重建。”皇帝不大相信，暗中派人到泉州查访，得知李宅乃一简陋古屋，对他更加敬重。后李告老还乡，皇帝赐马鞭一支，敕他三鞭为界，营建府第。所谓“三鞭为界”，即策马三鞭，以所及之地为相府范围。可李认为如此必占用大片民田，招致民怨，他日难免贻累子孙后代。于是来到偏僻的五塔巷，见一片荒芜旷地，才翻身上马，拿鞭子往马



图十六 李廷机像

背上轻拍三下,马跑不远,结果占地不多。李著述不少,有《四书臆说》、《四书讲义》、《春秋讲章》等。

万历十四年(1586年)唐文献榜,泉州二十人,创下明代泉州一榜进士的最高纪录,占全国进士二十分之一,单晋江一县就有十四人。且这一榜的泉州进士中人才济济,既有为泉州夺得明代第三个榜眼的杨道宾,有会魁黄汝良,又有著名史学家何乔远。杨道宾,晋江人,后官至礼部左侍郎,曾两次主持乡试,一次主持会试。黄汝良,字明起,号毅庵,晋江安海人,仕宦家庭出身。举进士后初授翰林院编修,后升至礼部尚书。黄汝良仕途近五十年,因不愿攀附魏忠贤,为其所不容,四次出仕,四次请归,可谓四上四下,四进四退。何乔远(1556—1628年),字穉孝,号匪莪,又号镜山,明代著名史学家,《闽书》作者。自少奇伟不凡,“胸趣空阔,于世无所不容,其道德文章,一代昭昭”。万历四年,二十岁的何乔远乡试中举人,授建阳教谕。十年后登进士。是年试题为《吾岂若使》,这是一篇《孟》论。何乔远独具胆识的才能,在这一试卷中已显露出来。在这篇论文中,他敢于“发人所能道,亦人所不能道”。他拿尧“使”舜,舜“使”尧,来论证“一德之交,则君使臣,臣能使君”的互补关系。初授刑部云南主事,擢礼部仪制郎中,因“奏牍不恭”罪,谪为广西布政司,任职不久即请假归里。魏忠贤曾多次派人拉拢,但他不愿与之伍,坚辞不赴,与邹元标、冯从吾、赵南星一同被并称为“四君子”。何一生虽不那么轰轰烈烈,但为人处世,道德文章,很受时人崇敬。“其出而当官,则与士大夫言政;其归而闭户,则与门弟子论学”。辞官居家近三十年,曾与杨文恪、陈及卿、李世贞、山人黄克晦等结社,称为“温陵五子”,共同探究理学,赋诗撰文。他又创建名噪一时的休山书院,亲自讲学达二十多年。因对其学识才华、道德修养的仰慕,来向他求教或与他切磋的人络绎不绝,所谓“慕镜山而思造门者踵



图十七 何乔远像

相接”。平生著述洋洋可观,除力作《闽书》及《名山藏》外,尚有《泉州府志》等。

万历二十年(1592年)翁正春榜,泉州的史继偕、洪启睿、苏茂相、林学曾等十七人登榜,且史继偕获殊荣,为泉州夺得了明代的第四个榜眼,而洪启睿则获得传胪。该榜状元翁正春为福州侯官人。这种同省人同科夺得状元、榜眼的盛事,在明代福建科举上有三次,另二次是永乐四年(1406)状元莆田人林环与榜眼长乐人陈全,永乐十年(1412年)状元长乐人马铎与榜眼闽县人林志。史继偕(1555—1629年),字世程,号联岳,晋江人。父史朝宜为嘉靖三十二年进士。史继偕于万历十三年中举人,举进士后累官至礼部侍郎,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。万历二十六年,曾充会试同考官。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二月会试,他与韩旷分别为正副考试官。同年三月,他与大学土方从哲、户部张问达等同为殿试读卷官,为取头名状元庄际昌受恶意攻击。是科,史继偕作为会试考官,取庄际昌等三百四十五名进士,因状元庄际昌进呈卷第三行刮补数字,又误写“醪”字为“胶”字。庄与史同为晋江人,故朝廷内外,舆论大哗,认为史作弊偏袒,私其门人,发出“鼎甲可以市恩”的责问。其实,

庄进呈卷的讹字问题，责任并不全在史。因为当时殿试读卷官总裁是宰首方从哲，再说状元又是神宗皇帝亲点的，容不了史作弊。而方从哲也早已在神宗时承认“进卷失常”，“恩恩认罪”，并已得到神宗的宽解，认为“简阅失详，既引罪，姑宥之”。可是，天启年间旧事重提，被《明史》列在“奸臣传”的户部阮大铖，复追论史继偕考选进士的问题，借题发挥，把史作为攻击对象。最后，还是天启皇帝出面排解，说：“大学士史继偕辩言官先后所劾得旨。卿孤介寡合，朕所鉴知，庄际昌卷，皇祖亲定，向认旧辅，今又及卿，正见卿别无所指，原自不必辩白，卿还即遵旨进阁，副朕眷怀。”（《熹宗实录》）其实，这不过是当时朝政腐败，朝官倾轧，互相攻讦的表现。史继偕由于才高政廉，在一段时间内署户、礼、工三部，曾“力清盘库盗帑积弊”；署都察院时，严加“稽覆”弊端；任吏部右侍郎时，对官员的考察，以“训廉”为主。所有这些，都在不同程度上，对一些官吏降黜起了一定作用，因而免不了引起嫉恨，故寻找借口对他进行攻击。面对攻击，史一气之下，一度辞朝南行。后升为东阁大学士，还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。苏茂相，字宏家，号石水，晋江人。二十六岁中举人，次年登进士。其题为《季桓子受之》的进士试卷，认为春秋鲁国大夫季桓子劝鲁君接受齐国女乐的举动是“以国荒也，非法色荒也”。发出“季桓子之奸臣也，非愚臣也”的议论。尤际端评其文章曰：“篇法、句洁、字法无一不妙”。举进士后，曾典试贵州，提督江西，累官至刑部尚书。后挂冠归，家居十年，与何乔远、李光缙等重修府志。这一榜的南安人洪启睿，据说本应获得状元，结果得二甲第一名，即传胪。据《南安县志》载：洪天资敏捷，读书一目数行，过便成诵，终身不忘。参加会试时成绩特好，礼部把他作为一甲第一名进呈给皇帝，即把他的试卷放在最上面。通常情况下，这位就是状元了。但是，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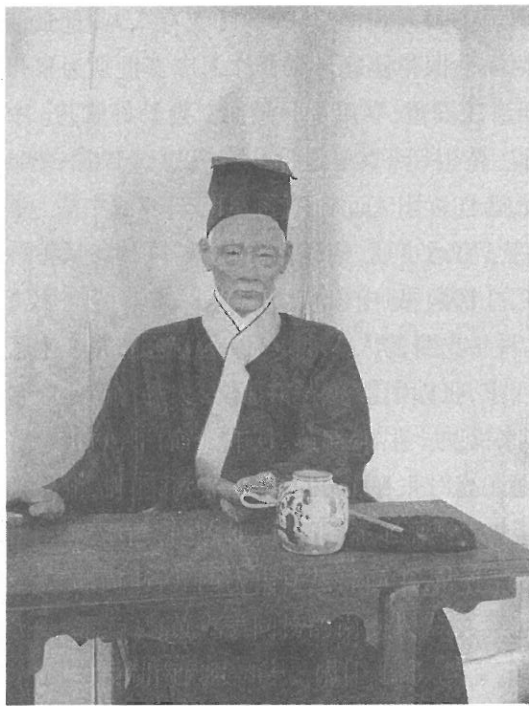
历皇帝殿试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当科状元是孝子，叫正春，于是殿试时把翁正春拔为第一，洪启睿则变为二甲第一。据说殿试前一夜，洪启睿也有一梦，他梦见清源山神与五虎山神战斗，清源山神败。第二天，殿试公榜，状元变成福州人。五虎山，即福州镇山。洪启睿为此寄书给族人，书中有“清源山低”之句。洪举进士后官至浙江右布政使，颇有政绩。

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年）朱之蕃榜，泉州有赖克俊、陈瑛、骆日升、蔡复一、林欲栋、戴廷诏等十五人。这一科，泉州不仅数量多，且好几人在会试与殿试中取得优异成绩。赖克俊会试第二名，殿试二甲第一名，官至礼部主事。陈瑛会试第四名。蔡复一，会试第七名。蔡是连捷进士，举进士时年仅十八岁，皇帝特诏给假归娶，风光一时，后官至江西左布政使，政绩显著。骆日升，字启新，惠安人，会试第三名。父亲骆廷伟是位名宦和学者，曾任广西提督学政佾事，年轻时即以撰写《天柱山志》声蜚八闽。在父亲的教育和熏陶下，骆日升当秀才时，为文就颇为著名，能“直抒胸臆，超逸跌宕，不依傍门户”，独辟蹊径，自成一家之言。万历十九年举人第三名，四年后会试中举。他在参加会试时，不畏落第和杀身危险，敢于直揭万历朝的腐朽弊政，试卷中有“武衰国耗”的激烈之语。主考官看了都“相顾错愕”，为他担心，但也都认为将来必定是位敢于杀身报国的节烈忠臣，击节祝贺道：“为子庆，为国家得人庆”。京都士子争相抄录传诵他的文章名句，因而一时“名高郢中，纸贵洛下”。举进士后，曾为官江西提学副使。期间，善为伯乐，拔擢不少优秀人才。如著名科技史家、《天工开物》的著者宋应星，就曾“执费门下”，拜他为师。后为四川监军时，少数民族地区叛乱，他率兵制止，兵败被执，不屈被害，年方壮年，为维护国家统一流尽最后一滴血，赠光禄寺卿。

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张以诚榜,录取三百零一名,泉州十一名,中有神童之称的同安金门人许獬,出手不凡,会试时第二名,殿试获第二甲第一名。许獬原名“行周”,即寄托着父亲对他的很大希望,希望他能步欧阳行周的后尘。据说,许獬曾梦见自己文场夺魁,名登金榜,从而产生无限的憧憬,发奋读书。万历二十五年中举人,次年参加进士考试却落第。但他并不气馁,继续在梵天寺读书。参政汪道亨延之署中,除读书论文章之外,不涉一私。万历二十八年(1600年),再次上京赴礼部试之前,他以文会友,与江苏才子太仓人王衡相会于肖寺。王衡自命不凡,唯独十分佩服许獬。他说:“今春的会试冠军者,只有我和你。”次年会试结束之后,他看到许的试卷,大为惊服,说:“第一属你了”。榜文公布之后,果然许獬名居首位,王衡次之。但殿试时,王衡又跃居前面,获得榜眼,许獬取得第二甲第一名。许獬会试所写的文章,人争传抄,使他名震京师,但他并没有因此得意忘形。他自励说:“取天下第一等名位,不若干天下第一等事业,更不若做天下第一等人品。”可见,在他的心目中,做“天下第一等人品”仍是最为重要的。他也确实身体力行,为人品质高尚,为官清正廉洁。可惜,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人物,仕途并不顺畅。后授翰林院编修。至今闽南仍然传颂:“天下第一通,晋江陈紫峰;天下第一肴(聪明、有才学),许獬进士头。”

万历三十五年(1607年)黄士俊榜,泉州的情况颇为独特。这一科知贡举的李廷机,主考杨道宾、黄汝良,同考黄国鼎,俱为晋江人。在明代的科举史上,甚而在整个古代科举史上,泉州人在一科进士考试中有这么多人同时担任主要考官,可谓绝无仅有。因为惧怕别人批评同乡互相提拔,于是黄国鼎“念同里多习《易》,请改阅《诗经》避嫌。将析卷,置房首皆南士,首易北卷以平之”。(《泉州府志》卷四四)即使如此避嫌,这一榜泉州还是有张

瑞图、林欲楫、杨道寅等十四人登榜,其中晋江就有八人,且张瑞图还获得明代泉州第一个探花桂冠,而晋江人庄安世则为泉州夺得了第一个武状元。庄安世,字可平,号念德,自幼好武艺。中状元后,历官至兵部主侍卫、锦衣卫侍领。张瑞图(1570—1641年),字长公,号二水,晋江青阳人。举进士前四年,乡试中举。举进士后,可谓扶摇直上,官运亨通,冠盖京华,极尽风神。从翰林编修、詹事府少詹事、礼部尚书、中极殿大学士,一步步走向明王朝的最高统治机构。科举出身的人大都写得一手好字,并产生了一些出类拔萃的书法家,张瑞图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这使他声名远扬,但也曾给他带来祸殃。张官场最得意之时,也正是魏忠贤势焰熏天的天启年间。当时张身在朝廷,精通书法,魏党的不少生祠碑文出自他的手书。魏党案发后,不免招来朝野清议。最初并没把他列入魏党名单,因并没发现他投靠魏党的真凭实据。后崇祯皇帝亲自过问此案,提出“瑞图为忠贤书碑”的问题,张因此被定为“逆案中人”。但也有人为他抱不平,认为“瑞图之书,为忠贤所爱,非实罪也”。就是说,张为魏党写生祠碑,并非主动依媚取容,主要是因魏喜欢他的书法,在当时情况下他很难拒绝,不能过分怪罪他,何况这也不是什么大罪。因此,虽身受恶名,士林交讥,却也只是乌纱摘去,罢官遣归。放归之后,情志郁抑,不久即卒。在宦海沉浮的仕途上,张瑞图可谓大起大落,而在艺术上,他却是一个极负盛名的书画家。《明史·文苑》载他“以善书名”,与华亭董其昌,临邑邢侗,顺天米万钟,“时人谓邢、张、米、董”。董其昌传亦写道:“同与书名者,为晋江张瑞图,时称南张北董”。张的书法,笔力不凡,行家称为“铁划银钩”。张墨迹现存无多,泉州承天寺、关帝庙、花桥真人庙,青阳白毫庵,安海龙山寺,南安雪峰寺,同安妙建庵等处,均留有他的书刻匾额。张又是位可入流派的山水画家。



图十八 张瑞图像

同榜的另一位晋江人林欲楫（1576—1662年），字仕济，号平庵，出于仕宦之家。父亲林武直，万历二十年武进士，官终广西永福守备。兄林欲栋，少称神童，万历二十三年联第进士，时年仅二十五岁，后官至南京光禄寺正卿、工部尚书。家庭环境，

尤其兄长的成就，对林欲楫影响很大。他读书刻苦，且“过目成诵，作文下笔衮衮不竭”。万历三十一年乡试中解元，四年后中进士，官至礼部尚书。

继张瑞图之后的万历三十八年韩敬榜，全国共取进士三百零二名，泉州有晋江的陈伯英、吴淳夫及南安的李夔龙、王振熙等十六人。其中吴淳夫与李夔龙两人同样与魏忠贤有瓜葛，颇遭非议。吴淳夫举进士后初为余姚知县，天启初历官陕西佾事，与李夔龙一道认魏忠贤为“义父”，结果一年内历官太仆少卿、太仆卿、右副都御史、工部右侍郎、右都御史、工部尚书加太子太傅。连续六次升迁，官至极品。崇祯皇帝即位后，先被罢归，随后又被

弹劾，抓入狱中，处以死罪。李夔龙为联第进士，举进士后曾为吏部主事，一度被罢官。天启初复官后，投靠魏忠贤，“引用邪人以媚魏忠贤”，官升至左副都御史。魏党败后，先被罢归，后如吴淳夫一样被人弹劾，言其有罪，皇帝下诏逮捕，处以死刑。这两位进士的下场可以说很可悲。

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周廷儒榜，共取三百四十四名，泉州有十名，人数虽不是太多，但科第名次同样显眼，晋江人杨景辰会试第二名，另一位晋江人庄奇显获得榜眼。杨景辰三十二岁才中举人，然而次年会试却表现优异，不仅一举登第，且取得第二名，后官至礼部尚书。庄奇显十八岁中举人，二十五岁中进士。明代泉州的一甲进士，到庄奇显时已六人，而庄是最年轻获得这一殊荣的。然而这位科场上的耀眼人物，仕途并不耀眼，且颇为短暂。举榜眼后，授翰林编修，补南京国子监司业，三十四岁就病死，可谓英年早逝，壮志未酬。临死前，作绝命词云：“非求生，求见老母一日；非憾死，憾虚父母此生。求者空求，憾者永憾，不忠不孝，谁结吾局？”词意极为凄凉。这一榜中还有一位颇为不幸的进士，即南安人洪承选。他在万历二十五年参加乡试时，中了解元，风光一时。后参加几次会试均落第。这一年会试中式，但未及廷试而卒，亦可谓乐极生悲，出师未捷身先死。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钱士升榜，泉州有十七人，同安的林轩又为泉州夺得一个探花。林轩后官至礼部侍郎，东阁大学士。这一榜中，还有一位后来颇有争议的泉州人，即洪承畴（1593—1665年），字彦演，号亨九，南安人。举进士后，累官刑部郎中、陕西参政、按察使、延绥巡抚。李自成农民起义爆发后，奉旨总督三边军务，旋加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，兼督河南、山西等五省军务。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，大败李自成于潼关。崇祯十五年为清兵所俘，后降清。清顺治年间，受命招抚江南，后又受命入湖广总督军务，督师

征贵州。

万历四十七年(1619年)己未科,泉州大出风头,达到了明代会试的一个高峰。该榜共取三百四十五名,泉州有十三人,其中庄际昌会试殿试俱第一,一举获得会元和状元,成为明代泉州唯一的一位文状元。庄际昌,字景说,号羹若,祖籍永春,出身名门。曾祖庄用宾,嘉靖年间进士,历官至浙江按察僉事,太仆寺少卿。庄际昌幼时天资极高,过目成诵,府志载他“为诗文不经思索,濡笔立就”。书法也不错,“性不喜摹帖,而临池挥洒,遒劲天成”。万历四十三年中举人,次年会试落第。三年后再次参加进士考试时,会试、殿试皆第一,并被正式定为状元。但是考完之后,有人查阅他的答卷,发现他在对策时书写不规范,把“馬”字写成“马”字,即把马脚的四点写成一划。这样的失误,按现在的观点来看,根本不算什么,但在当时却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。有人告了作为主考官的泉州人史继偕一状,说他“私其门生”。幸亏史是神宗皇帝的亲信,才得以“疏而不究”,保住了庄的状元地位。但这场波折却大大扫了庄的兴。既然,马字四点讹写成一划,有如马的四脚被绳子捆住,而状元按惯例要游街,“白马挂金鞍,骑出万人看”,游街是要骑马的,马脚被捆如何行得?于是把游街免了,同时也不授任何官职,就这样回家了。又有一种说法是,庄的进呈卷第三行刮补过数个字,又将“醪”字写成“膠”字。按规定,进呈卷是不得有差错的。所以,庄的境遇与众不同。但他所以落得这个结局,可能不仅是因殿试对策误书一字,而是还有其他原因。谈迁《枣林杂俎》说:“万历己未科会元庄际昌,廷试策偶误笔,以涂注不便进呈,例任之,果第一。其后,论者谓醪劳不辨之状元,遂回籍读书。盖方相国从哲,借讦之也。”看来因朝廷的政治斗争和人事矛盾而借机将庄奏劾。无论什么原因,庄毕竟高中状元却扫兴而归,直至天启元年(1621年),明熹宗即位,才补授



图十九 为庄际昌所立的“会元状元”坊碑

翰林院修撰,召修国史。居官期间,刚正不阿,耿直敢言。天启五年,分校礼闈。会试那天,试目迟迟未颁,主考令人登屋传呼外帘官,他极力制止,曰:“内外之防,祖制也。此防溃蔑不溃也。”他对科场上营私舞弊的官僚,包括魏忠贤,敢于针锋相对。因而,也为魏所怀恨。他深感朝廷昏暗,难以竭诚尽忠,兴利除害,于是一度乞请还乡。居家期间,积极引掖后进。魏伏诛后,再次奉召入京,被封为左春坊左庶子,兼翰林院侍读。五十二岁病逝于京都,崇祯帝为褒其业绩,特追赠为詹事府詹事。邑人为悼念这位本府状元,特在郡城府学之西,建造“庄若羹祠”,祠内有联云:“品比青阳梅树,玉洁冰坚,不愧大魁天下。学宗朱泗杏坛,升堂入室,证拟仞数宫墙。”明代福建连得会元和状元的,仅有两人,另一位是福州人陈安。

明末,泉州出了不少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人物,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人,即蒋德璟和黄景昉。两人既是前后科进士,又在崇

祯期间同朝为相，是一个颇为罕见的现象。天启二年（1622年）文震孟榜，蒋德璟登榜。蒋德璟，明末著名的政治家。父亲蒋光彦，进士出身，官至广东布政参议，有武功政绩，因忤当事，弃职宦场，返乡归养。蒋德璟从小受到父亲耿直性格的陶染，这对他以后成为著名的政治家，起了重要作用。蒋德璟参加会试时，以《古之贤人》、《仁远乎哉》、《子之武城》、《周有八士》、《知天地之化育》、《贤孝而后乐》、《得道者多助》等议论纵横的文章中了进士。蒋讲话带有较浓的闽南乡音，朝中有人说很难听得懂，而皇帝还是颇为喜欢他。魏忠贤揽政时，蒋因不愿依附，一度被罢官。魏党垮台后，才重新起用，迁少詹事，擢礼部侍郎，晋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又改任户部尚书，太子少保兼文渊阁大学士。明王朝此时已是风雨飘摇，蒋虽也深知大势已去，仍忠实履行阁首职责。崇祯十七年（1644年）三月，在明王朝已行将覆灭前夕，蒋与皇帝作了一场激烈的辩论，大大激怒了崇祯皇帝，“引罪”去位。在蒋德璟举进士后三年，即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余煌榜，黄景昉登榜。黄景昉七岁就颇能作文，十七岁入泮，十八岁中举，中进士时二十八岁。后官至太子少保、户部尚书、文渊阁大学士。他与蒋德璟两人在当时可谓才识卓具，忠心耿耿，故于崇祯十五年同时受命入阁，同朝为相，成了崇祯皇帝的左右手。但是，其时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，他们两人纵有不凡本事，终难回天。蒋获罪，黄也受累，欲削其籍，自上疏引归。不久，明王朝就灭亡了。

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刘理顺榜，共取三百零二名，泉州有九名，其中晋江的李焜开始以为中了状元，结果空欢喜一场，只得了传胪。《泉州府志·拾遗》载：是科殿试结束，忽然有人报说李焜中了状元，整个泉州城都轰动了。于是为李焜竖起状元旗，有关官吏也纷纷到李焜家道贺，大大热闹了一番。几日后，才发现

弄错了。原来，会试结束后，礼部确实拟把李的试卷放到第一位，但在殿试前忽然换成刘理顺，而以李为二甲之首。殿试时，皇帝就按照这个名次圈定了。同榜的惠安人张正声，祖父张瑞，据《惠安且志》载，从小“刻志力学，隆冬盛暑不辍，至于肌形癯削，呕血数升”。即使如此，仍然“披吟自如也”，可见读书是如何的刻苦。也正因如此用功，嘉靖十七年举进士，当过四川叙州知府，五十多岁即归隐。张正声从小受祖父的严格教育，加之资质颖慧，故较早就在科场中显示出不凡的实力。

崇祯十年（1637年）刘同升榜，泉州有蔡道宪、林期昌、黄润中、等十四人。其中的蔡道宪，会试第九名。据府志载，蔡道宪少年时文章就写得不错，文思敏妙，谈古今兴亡，反复淋漓，感慨悲歌，下笔累千言，书法迥逸过人。相传蔡道宪上京应试，连捷考上进士后，曾前去拜见时为尚书的同乡兼长辈黄景昉，但因蔡出身低微，其父曾为大户人家的吹鼓手，且他少年得意，裘马翩翩，众人目他为“狂生”，故黄竟拒绝接见他。但是，蔡中进士后任湖南长沙府推官，在张献忠农民起义军攻长沙时，明廷巡抚王聚奎等大员皆闻风而逃，独蔡道宪以“忠义”自任，带五千人坚守围城，结果城陷而被执，招降不从，遂被杀死，时仅二十九岁，明廷赠封“忠毅”。至此，黄景昉才感到当时对蔡不妥，故为东石蔡道宪祠撰一长联：“少年裘马翩翩恼我犹惭交味淡；泉郡衣冠济济微君谁报国恩深。”

崇祯十三年（1640）魏藻德榜，泉州有十五人，其中蔡肱明、张朝颀、卢若腾三人的授官，却没有按照惯例。《东崖杂记》载：当年廷试后，皇帝又从二甲进士中召对四十人，蔡肱明，张朝颀，卢若腾都在其中。蔡为二甲第一名，按例应授官礼部主事。但此时农民起义四起，明王朝到处告急，皇帝想从新科进士中，挑选一些人充实到各地。于是蔡、张、卢三人并授兵部主事，蔡旋又被推

荐到四川威茂道督学。但到四川不久,农民起义蔓延,蔡竟死于乱中,这也是因福致祸,意料之外。如果按常例,蔡可优游于京师之署,本无性命之虞。这种难以把握的命运,令许多人为他嘘唏叹息。

崇祯十五年(1642年),明王朝在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沉重打击下,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。崇祯皇帝为维持摇摇欲坠的政权,急需搜罗一些人才,于是开了一个特科考试,录取了一大批人,特赐进士,故有所谓钦赐进士之说。泉州有九人登榜。次年,又按定制开科,泉州有十七人登榜。但是,明王朝此时已无可救药,回天乏术,无论崇祯皇帝采取什么措施,也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。第二年,明王朝就土崩瓦解了。这最后一榜的泉州人中,沈全期值得一提。沈全期(1608—1682年),南安水头人,从小刻苦用功,博览群书,学识渊博,当过塾师。崇祯十五年乡试中举,次年连捷进士,授吏部郎中。明亡,沈悲愤归家,闭门谢客,誓不事清。后为郑成功得力幕僚,极力赞同收复台湾,并随郑誓师台湾。复台后,见当地缺医少药,便以过去所学医术,行医济世二十多年,直到逝世,为发展台湾的中医事业作出不小贡献,被台胞尊为“医祖”。

《泉州市教育志》所载明代泉州进士名录,有二榜实际上不存在。一是万历二十五年(1597年)丁酉科,南安许国抒登榜,所载来源是《南安县志》。显然有误,因这期间三年一科已成定制,且万历二十三年及二十六年均开科,二十五年并没有开科。这从《明清进士碑名录》,也可得到证明。二是崇祯九年(1636年)丙子科,南安许金砺登榜。所载同样有误,道理如前述,因是年并没开科考试,而在这之前的崇祯七年及随后的崇祯十年,均按定制开科,且泉州有不少人榜上有名,这从《碑录》也可看得很清楚。

表七:明代泉州进士分县统计表

县份 年代	晋江		南安		惠安		安溪		永春		德化		同安		合计	
	文	武	文	武	文	武	文	武	文	武	文	武	文	武	文	武
洪武	12						1						3		16	
永乐	20		3		2						1		4		30	
正统	2												1		3	
天顺	2												1		3	
成化	5		2		2								1		10	
弘治	21		3				1						1		26	
正德	15		3		1								3		22	
嘉靖	79	4	14	1	15		2		1		1		17	2	129	7
隆庆	22		1						1				6	1	30	1
万历	117	34	30	1	17	1	3	1	6		3		38	9	214	46
天启	12	3	6		1	3	2				1		4		26	6
崇祯	50	2	16	3	7		1				1		11	1	86	6
总计	357	43	79	5	45	4	10	1	8	0	7	0	90	12	596	66

除文进士外,明代还有武进士。成化十四年(1478年)设武科会试,悉视文科例。泉州有六十六名武进士,还有一名武状元,即晋江人庄安世。这些武进士中,有几位值得一提。如俞大猷(1503—1580年),泉州河市人,明代抗倭名将。其祖俞敏有军功,世为泉州卫百户官。俞大猷少有奇志,发奋攻读,苦练武功。进秀才时,曾师从名儒王宣学《易》,并得理学大家蔡清之传,且精研兵法。嘉靖十四年(1535年),俞考中武进士第五



图二十 俞大猷像

名，累官都指挥僉事、崖州参将、浙直总兵。其时东南沿海屡遭倭寇侵扰，俞从嘉靖三十三年到四十五年，驰骋于抗倭战场，历经数以百计战役，屡战屡捷。尤与戚继光联合作战的龙山、平海卫等著名战役，均大获全胜，使倭寇闻风丧胆，立下显赫功勋。

又如陈有纲，晋江永宁人，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年）武会试中式，殿试第三名，获武探花，后授官广东都司。如孙胤武，字伯震，惠安人。自幼在家庭支持下，不惜重金

聘请名师，率胞弟孙炎龙、孙灏苦练武功。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年）中式武举人。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进京会试，以高超武功，博取众彩。接着殿试，对答如流，切中时弊，认为国家要强盛得改进国策，整顿边陲，严肃吏治。也许词意过于激烈，结果落第。他愤愤地说：“当今朝廷不用。”三年后，再次入京应试，殿试时答对仍很精辟，崇祯帝即批为“御览对策天下第一名”。但当时状元已定。据说，崇祯帝让他以状元循例游街，并赋予他回家乡惠安跑马围埭为税田。惠安的跑马埭因此而得名。登武进士后，被授江南铜山参将、昭武将军。其弟孙炎龙，天启元年中式武举人，官至正四品指挥僉事。另一胞弟孙灏，同他一起于万历三十七年中式武举人。

明代泉州科举的特点

明代泉州的科举，倘若与唐、宋、元代作一比较，也有一些比较显著的特点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：

科举绩效位居福建前列

科举绩效而言，如果说泉州曾在宋代创造过辉煌成就，在当时的福建以至全国都有重大影响的话，那么，明代的泉州，所取得的成就及发生的社会影响，并不亚于宋代，某些方面甚至超过宋代。诚然，明代前后二百七十多年，与宋代的三百一十多年相差不多，而明代泉州文进士数量仅近六百名，这与宋代的九百二十多名相比，确实是少了。然而，就其实际绩效与社会影响而言，明代并不逊于宋代。这是因为：第一，举人与进士数量众多。从举人数量看，按《福建通志·选举》载，明代福建举人共有八千三百二十五名，其中福州二千四百五十八人，居第一位。泉州一千七百三十四人，已跃居第二位，不仅远高于居第四位的漳州府的一千零三名，且略高于居第三位的兴化的一千六百九十二名。按县排名，举人最多的前十县依次为：莆田、晋江、闽县、龙溪、侯官、长乐、漳浦、福清、怀安、同安。这十县中，泉州占有二县，其中晋江一千零三十八名，居第二位，仅次于莆田县的一千五百九十六人，高于居第三位的闽县的九百六十九人。明代泉州进士的绝对数量虽比宋代少，然相对于福建和全国其他府州而言，泉州所占比例不仅没降低，反而进一步增大。明代开科九十多次，录取进士二万四千六百名，比起宋代的二万九千名要少。平均每科所取二百七十名左右，与宋代大体持平。泉州进士六百名，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，所占比例虽比宋代略低，但明朝的管辖范围要比